

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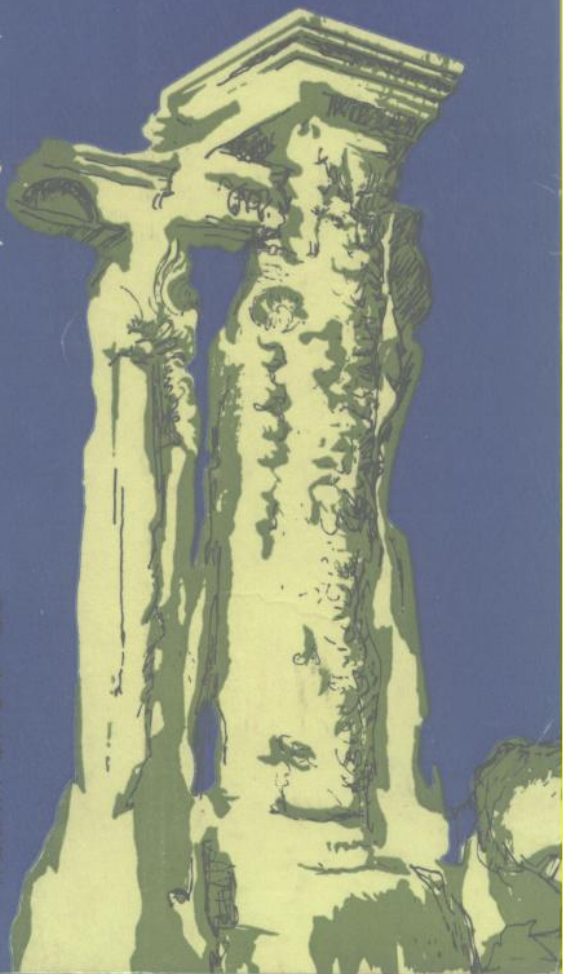
JINDAI ZHONGGUO
WENHUA ZHU WENT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MA YONG · ZHU

中国

JINDAI
ZHONG
GUO
WENHUA
ZHU
WENTI

文化诸问题

马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83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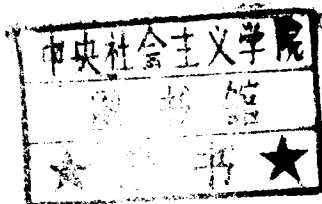
K203
84



200312679

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

马 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 新登字 101 号

特约责任编辑 唐克敏
封面装帧 诸钺庆

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

马 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宝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8,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340-3/B·168

定价: 5.60 元

自序

关于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前途的思考，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参与讨论的人次也最多的课题之一。20年代开始的中西文化大论战，几乎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80年代形成的“文化热”，也正以其方兴未艾之势向纵深发展。这一课题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广泛重视，显然不仅仅在于文化本身，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前，中国文化虽和域外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有过交流、冲突及融和的过程，但大体上说来，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都是东方文化下的分支。二者之间虽有明显的不同和冲突，然其基础基本相似，都是农业社会、等级社会的产物。因而，二者经过几百年的冲突、碰撞之后，或援佛入儒，或以儒解佛。至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道释三教合流，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结合基本完成，二者大体平分秋色。

然而，明清之际开始传进的西方文化，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虽经过300多年至少是150年的冲突之后，仍未能获得圆满的解决。

中西文化的冲突之所以长时期得不到圆满解决，除去文化性质的根本不同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传入中土，除了宣传宗教教义、开辟新的宗教社区之外，并没有领土、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企求。而西方文化则不

然，不仅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向中国兜售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之外的企图，即使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的同时，在潜意识层面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为他们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服务。将他们一概视为“文化侵略”固属过份，但中西文化一开始接触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则为明显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开始了对自己文化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构想与设计。不论这些构想与设计存在多么大的差距与不同，设身处地的为古人着想，这些中国人的目的无疑都在于如何振兴民族文化，使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能够泰然自若，给予积极的回应。

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不必说了，即使是那些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物，如果历史地考察他们的真实心态，也不难觉察他们的所忧所虑不仅有现实的依据，而且也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一般说来，他们看到了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固然在某些方面较中国文化优越，但由于社会基础的不同，即便是中国文化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其作用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也势必要大大地打个折扣。因此，清末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除极个别的人物坚决拒斥西方文化外，一般地总是期望以中国文化为主干，有拣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合乎中国国情的内容。

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们有感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客观事实，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充分吸收外来文化，改造以至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实生活不相和合的内容。当然，激进主义的主张发展到理论上的全盘西化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而且极易使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不过，他们对祖国、对民族的挚爱，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需要而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状态，都是值得理

解和同情的。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近代国人关于中国文化命运与前途的思考缺乏真切地理解与同情，或斥文化保守主义为封建顽固，或责文化激进主义为卖国求荣。显然，如何重建近代国人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作的种种思考的真实历史与心迹，恐怕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

本书从较宏阔的历史背景描述了西方文化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以来至清末的种种遭遇，以及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的种种回应，设身处地的探讨了古人的心迹和理论上的利弊得失，在传统的解释之外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由于本书的基础是几篇独立的论文，因而对近代国人关于中西文化的思考并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而是拘于笔者最感兴趣的几个方面。同时，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因而这些见解有些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善，有些可能还存在着疵点或不一定能够成立。深盼学术前辈与读者批评教示。是为序。

1990年8月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文化的初步反省	2
新大陆文明的发现	2
文化交流的正常心态	7
不得已：宁愿中国无好法	12
第二章 政治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	21
政治的变动与文化政策的调整	21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文化冲突	24
复古旗帜下的革新	29
第三章 亡国的刺激：以夷之长技以制夷	35
繁荣中的危机	35
乾嘉学术的分化	38
将亡中的中国	41
救亡的呼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44
第四章 中体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	53
选择的困惑：学什么？	53
调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必由之道	62

中体西用：也算是一种尝试·····	69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	75
坚船利炮仍不足以救国·····	75
变法：困难重重的探索·····	80
传统新释：迂回的救国路线·····	8c
第六章 传统与现实的厮杀·····	94
传统的巨大牺牲·····	94
传统与现实的冲突·····	100
复归传统·····	107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	115
超越中西：中国文化的真正解救·····	115
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建构·····	122
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132
信仰的危机与重建·····	132
权威的丧失与重建·····	136
固有文化的贫乏与局限·····	148
第九章 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155
孔子之道必在坚决排斥之列·····	155
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	159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转化与重造·····	162
第十章 寻求中西文化结合的契机·····	169
融汇中西：中国文化的重建·····	169

非儒学派的复兴:减轻儒学独尊的束缚	179
充分世界化: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188
第十一章 中国本位的人类文化互补论	205
中国精神的迷失	205
对儒家精神的呼唤	216
对儒家精神的重新阐释	225
儒家精神的实践意义	235
儒释道互补	242
以中国社会存在为本位的人类文化互补论	250
第十二章 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看其未来前景	266
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266
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现代化	273

引 言

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思考，源于中外文化的接触与比较。换言之，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就不会发生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思考，中国文化也必将以其固有的形态继续发展。因为，在中外文化接触之前，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发展系统。

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言，中外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先后有两次，前一次是东汉之末由印度佛教文化东来引起的中印文化冲突，后一次则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中叶以来由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引发的中西文化问题。中印文化的冲突，经过一千余年的争论，虽然仍未获得理想的解决，如国人在理性的层面仍难认定佛家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经过唐宋明阶段的发展，儒道释三家虽不能说相安无事，却在内容与形式上做到三教合流，平分秋色，取得了某些共识。

而后一次则不然。西方文化自从传入中国之后，三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本来似乎比较明了的问题，一旦放到理性的层面去思考，马上又露出新的矛盾，因此，要想妥善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国人的思考历程。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文化的初步反省

新大陆文明的发现

相当于15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刺激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明孝宗弘治十年即公元1497年，达伽马率领4艘船绕过南非好望角首航印度，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郎机。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通过行贿手段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开始和中国和平通商。勿庸讳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和远东掠夺财富，开辟新的殖民地。

踏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之后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派别，他们为了弥补乘宗教改革兴起的卡尔文新教所造成的损失，竭力主张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向远东扩展势力。

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在舰队和大炮的护送下开往远东。1541年4月7日，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从里斯本启程。1549年8月抵达日本，在那里遇到有极高文化素

养的中国人。他发现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相信在他们中较容易传播信仰。他注意到每当与日本人辩论时，日本人总是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在涉及宗教问题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上也莫不如此。这种意外的发现更促使他决心向中国传道。1552年8月，沙勿略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上川岛当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一个贸易点，只有一片由树叶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由于明王朝严禁外国人登陆，沙勿略在那里陷入困境，不久害了一场热病，于同年12月2日病死该岛。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但他的努力激励他的同道终于撞开中国大门。1557年葡萄牙人抢占澳门后，耶稣会便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皮莱士和戴西拉在澳门定居，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并选派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4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到澳门，寻找机会进入中国。范礼安、巴范济先后在澳门死去。1582年，罗明坚得到广东地区行政负责人陈文峰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然为时极短。

和罗明坚同行到达肇庆的利玛窦开始有意识地与中国地方各级官员和文人交往，宣传欧洲文物和典章制度。并在叙述各国不同宗教仪式时，适时加进中国人当时还不知道的有关基督教的圣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以这种方式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中国。由于利玛窦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使他在向中国人解释中国人尚未知道的那些东西时，轻而易举地震慑了中国人。特别是他关于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减轻了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恐惧。在这之后，利玛窦又用铜和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使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是善良的人和有学问的人。“当时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

重，倾一时名流。”^①

利玛窦在肇庆的成功，只是个别现象。耶稣会传教士在当时只限于东南沿海活动。他们既然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就必然受到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中国人的顽强抵制，以致有些传教士不得不哀叹若没有军队的帮助，对中国人便一个也不能教化。然而，他们并没有那样做。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高度文明的国度里传教，仰恃武力，不论多么强大的战舰、多么声势浩大的军队都难以奏效。要想在中国立足和传播福音，就只能象佛教徒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借助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形式，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政治上维护中国君主的统治，在生活习惯上灵活地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坚持持久和平的传教路线，以高水平的学术赢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

在这种和平传教路线的指导下，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科学文化，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必否认，他们介绍的西学具有极强的宗教意识和时代局限，在相当程度上把一切知识作为神学的婢女传入中国。他们极少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和实验科学为主要内容及特点的西方新学，而侧重于介绍以神学为主体的所谓“六科经籍”。

而当时的西方自然科学冲破神学的樊笼，正突飞猛进发展着，获得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成就，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刻卜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演绎法、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学、波义耳的新元素说、塞尔维特和哈维的血液循环说等等。然而，对这些进步的学说，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或只字不提，讳莫如深，或

^① 陈仪：《性学概述序》。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73页，中华书局，1988年。

尽管有少量的介绍,不仅支离破碎、语焉不详,而且时间很迟。致使后来中国人了解到这些内容之后,不禁对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愤愤然,气难消。

然而,设身处地的为利玛窦们想想,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当时这些传教士的心态和苦衷。这些传教士身为教会中人,而我们上面列举的新学说在当时的西方不仅并未定论,而且几乎一律被判为异端邪说,我们怎能指望教会中人向我们详细介绍这些异端邪说呢?参照中国文化的外传和世界其他文化的外传,何时不是传播那些稳定而几近保守的文化,何尝传播过“异端邪说”?

基于此,我们不应苛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他们能将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逻辑学、盖仑的人体解剖学等古典学说介绍给我们,使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世界就不错了。何况从主观上说,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总是试图站在欧洲学识的高峰上,拿出学术上的最高水平,经常让他们家乡的人们把欧洲对于科学上重要的一切新事物,给他们向中国邮寄呢?平心而论,当时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大多关心欧洲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并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会规定的情况下,适时引进过不少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仪器设备。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一方面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固有文明抱有极大尊敬,希望能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这一正常的文化心态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之始即已存在。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但他对中国智慧则表示相当浓厚的兴趣。利玛窦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过深入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对孔子哲学表示极为钦佩,并把孔子

及四书五经热情地介绍给西方人。他指出，如果西方人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就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与任何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利玛窦也表示极为钦佩。他指出，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人曾一度很精通数学和几何学，中国的天文学虽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但中国天文学家也丝毫不费力气地将天文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得出与欧洲人几乎相同的结论。

利玛窦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在16、17世纪前后，中国的文明发展与以前的相比，虽有某些不足，如王学的空疏，但与当时的欧洲相比，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中国文明并不落后，相反，在许多领域仍处于先进行列。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吸收中国文明，改造西方固有文化。在那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欧洲思想界、政治界的知名人士无不对文明中国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贤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发达，足以作欧洲人的楷模。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只要翻开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等著作，就不难发现里面对中国文明的赞美比比皆是。

在这种心态的指导下，利玛窦、龙华民和其他传教士自1590年起向欧洲寄回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兴奋热烈的信件与年报。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既是基督教的一个有待开辟的信仰区域，更是欧洲感到陌生的新发现的大陆。欧洲人大量翻译了中国古代文献，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文明的著作，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学。中国的文明与科学对欧洲的发展确实起过重大的作用。18世纪，正当欧洲的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倡导理性主义，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崇尚人类认识自

然规律和理性法则的合法性，提倡智慧与教育，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主导思想基督教神学处于鲜明对立的地位。殊不知，这种启蒙思潮的主要来源恰恰正是耶稣会传教士介绍给西方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不仅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辨哲学、伏尔泰的自然神教观、魁奈及杜尔哥的重农学说，无不与中国古典文明有着一种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的绪言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正是中国的文明促使了欧洲的觉醒。他甚至认为应该请中国人前来指导欧洲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他写道：“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无疑中华帝国已经超出他们自身的价值而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盛誉，其影响之大也由此可见。”^①至于莱布尼茨的科学成就，如二进制、单子论与中国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文化交流的正常心态

欧洲人看重中国文化并把它们大量介绍给西方，同时，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和欧洲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固有文明的缺陷。因此，他们也着力向中国介绍欧洲文明，以期中西文化真正交融。从利玛窦开始，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

^① 陈安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4~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足。同时，他们也指出，一方面，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由于没有逻辑规划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结果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

另一方面，早期传教士多次强调，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来说，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别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与主宰者，是无始无终的，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中国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因此，早期传教士从一开始来到中国，就儒冠儒服，以此证明基督教与中国儒学并无本质的差别。但是，传教士们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学的一致性，仅在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才是“真儒”，后儒则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卫方济语），虽与佛老有所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返于先儒，进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最终达到“超儒”，建立中国文明新体系的目的。为此，传教士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指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学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宗统意识的“天地”、“太极”取代“天”或“上帝”，不仅和基督教“创世纪”的观点相矛盾，也与先儒